

题苏继庠先生旧藏清抄本《考定苏文忠公年谱》

辛 德 勇

时下期刊网络，述及藏书之家，每喜展示书房景象。房间格局或宽敞或狭促，书籍陈放或规整或杂乱，真正懂书爱书的观摩者大多并不在意，目光所向，往往是书的名目，更想看看楼主有什么珍稀的收藏，而并不在意存放书籍的书屋和书橱是否富丽堂皇，这正应了过去流行的一句老话：“有书真富贵。”不过所谓珍本秘籍，实际上可以分成两大不同的类别，一类侧重版刻形式和年代的艺术价值，一类侧重文字内容的史料价值，前者多为达官贵人所重，后者多为文人学士所藏。这两种书房内的景色或品位，差别是很明显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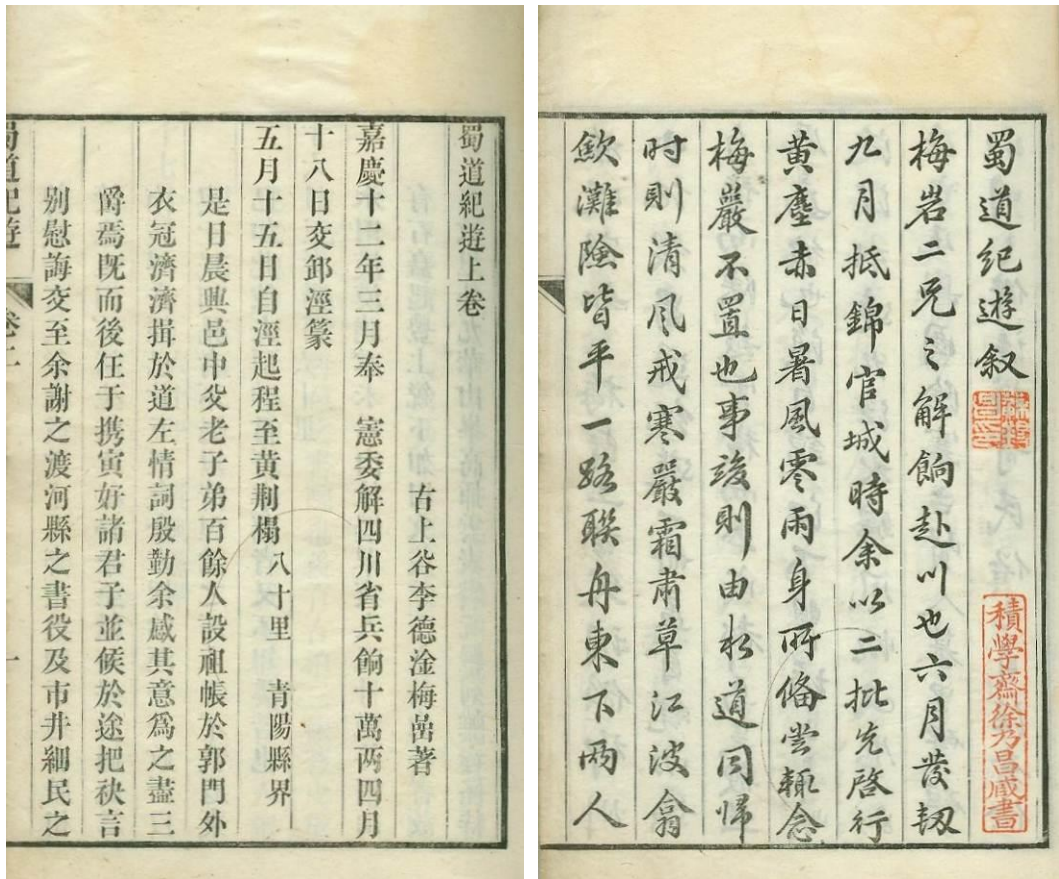
不过，时至今日，文人学士的书斋，大多已经略无藏书可言。我辈只能通过书目，依稀领略昔日的景致。最近承蒙友人相示，看到一份苏继庠先生在文革期间书写的藏书目录复印件，自题“苏继庠的书籍清单”，正文首书“恭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万寿无疆 万寿无疆”，其下为简要说明，谓“本人四十多年前在商务印书馆工作时，因为参考的便利和自求深造的需要，就好收买新旧书籍。以后也是如此，因此历年所收，总计当在一千种左右。今特将本人现存各书开列清单于后，其中有旧刻本，稿本，新旧抄本，校本，以及现时很少见的排印本和影印本都有。政府如认为其中有值得成为善本的，自应检出捐献，俾可永久保存”。经历过那个特殊年代的爱书人，读到这段文字，恐怕都会感同身受，涌上一股深重的酸楚。

苏继庠先生在这份藏书清单前复写有总体说明云：“此书单分为四类：甲类大部分是线装书，惟亦有极少数他种装订书；乙类是敦煌遗书；丙类是旧梵本佛道二经；丁类是日本人所写所刻的佛经。”我所看到的复印本，只有上述甲、乙两类书籍，展卷一读，从宋刻元槧，到名人批校明清佳本，以至孤秘罕传的写本抄本，诚可谓琳琅满目。即使按照当时较高的标准，大部分也都是名副其实的善本；现在看来，则有更多的书是在“应检出捐献”之列。

除了一般的珍本善本意义之外，由于长年关注古代中西交通等史地问题，苏继庠先生藏书的一大学术特色，是十分注重古代地理书籍，不仅数量丰富，而且一些特别重要的典籍，还已聚成比较完整的系列。例如《水经注》藏有明嘉靖黄省曾刻本、万历吴琯刻本、万历朱谋𣎵《水经注笺》校本、日本松崎氏过录王国维校朱谋𣎵《水经注笺》本、清康熙项綱群玉书堂刻本、乾隆年间曲阜孔氏微波榭刻戴震校本，以及原刻本汪士铎《水经注图》等。又如《穆天子传》藏有明范钦天一阁刻本、吴琯刻本、程荣刻本、“独山莫氏录五砚楼影宋本校”本，以及成蓉镜手批道光刻陈逢衡著《穆天子传注补正》本。这样的收藏，为深入认识相关问题，会提供很大便利，而今即使财力雄豪，也已经很难备置于一室。

学者书架上的善本书籍，除了像《水经注》和《穆天子传》这样的名著之外，往往会有一些看似平常而实际比较重要的稀见之本。在苏继庠收藏的地理类书籍当中，有一部书题作：“《蜀道纪遊》二卷，清李德淦著，嘉庆刻，二册。”嘉庆十二年，作者李德淦在安徽泾县知县任上，远赴四川，押解兵饷，这部书就是李氏此役的行程记录，记述沿途山川物产习俗甚为详明，研治史地者颇足参证。印本刊刻于嘉庆十三年，内封面署曰“学脩堂梓”。审其卷末印有泾县学者赵绍祖跋语，而刻书所用纸张、版式、字体都与同一时期赵绍祖氏刊刻的《通鉴注商》、《新旧唐书互证》等古墨斋自著书籍相同，所以，应当同在泾县当地刻印。这一年代的清代刻本，时下的公藏书目大多并不会定作善本，但与赵氏古墨斋诸书传世稀少一样，这部《蜀道纪遊》也十分罕见，《贩书偶记》正、续编都没有著录，罕秘若此，似乎就值得

珍重藏弃了。民国时邓衍林编纂《中国边疆图籍录》，虽然载有此书，却把书名错印成“蜀道记遊”¹。今人编制《四库未收参考书目》，复有错印成四卷本者。后来王绍曾等编纂《清史稿艺文志拾遗》，因未能见到原书，转据邓衍林和其他人的记述，同样误记书名，并附列并不存在的“四卷”这个卷数²。这些书目，都不如苏继庠这份清单著录得准确。自数家珍，当然不容易出错。



苏继庠旧藏《蜀道纪遊》内文首页与卷首陈柄德序

像《蜀道纪游》这类流传稀少的晚近刻本，由于名头不够惹眼，获利空间有限，书商通常不会着力搜求，学人购藏殊为不易，往往都是可遇而不可求，只能依赖丰富的文献学知识，长年累月，勤访细察。对那些一时未能遇见而又确实需要的重要典籍，则只好退而求其次，购买传抄的本子。在苏继庠先生这份藏书清单中，有一部《使喀尔喀纪程（草）》抄本，就属于这种情况。此书刊刻于道光元年，作者为清朝满族官员昇寅，本书是他在嘉庆十八年夏天出使喀尔喀之役的纪行诗集，不惟“途路所经山川风物诡伟魁殊托诸篇章，备其情状”³，而且在诗集后面还专门附有一部分题作“纪程”的内容，一一记述途中各站里至与沿途风物，是研究口外蒙古地区地理的重要文献，印本虽写刻精雅，堪称善本，却行世甚少，难得一见。苏继庠先生也一直没有能够找到刻本，只好收下一部抄本，以敷检读之需。

我等展读此等抄本，尤易体会前辈学者罗致典籍的精勤。大半生钟情所得，而今不得不一一列出待缴，还要为之三呼万岁，是书厄，更是人厄世厄。我不了解苏继庠先生藏书后来

¹ 邓衍林《中国边疆图籍录》（上海，商务印书馆，1958），页294。

² 王绍曾《清史稿艺文志拾遗》（北京，中华书局，2000），页622。

³ 清昇寅《使喀尔喀纪程草》（清道光元年思补过斋刻本）卷首徐养灏题词，页8a—8b。

的命运，不过若干年前，曾在京城购得上文所说《蜀道纪遊》一书，可见未能整体保存下来。在这部《蜀道纪遊》上面，除了先生的藏章“苏锡昌印”之外（苏继庠先生本名锡昌），还钤有“积学斋徐乃昌藏书”楷书朱文长方印记，知本属积学斋中清刻佳品，苏继庠先生自然会愈加珍重。近日忽闻苏氏旧藏尚有部分珍品即将拍卖出售，并蒙友人相邀，得以先行观摩，我首先关注的书籍，就是这种学人特色最为鲜明的普通抄本。

在这批劫后幸存的古籍当中，有一部明末人郑鄮撰著的《考定苏文忠公年谱》，内容看似平常，不过是为前代著名文人排比生平经历而已，溯其由来，却殊为沉痛，涉及明末一大政治事件。

本书作者郑鄮，是明末东林党的重要成员，籍隶常州武进。天启二年刚刚考中进士，即因直接指斥阉宦魏忠贤，被贬秩外遣，回乡闲居¹。天启五年，魏忠贤借熊廷弼案罗织扬涟、左光斗等人下诏狱致死，郑鄮又撰写一篇《黄芝歌》，公然讥刺魏忠贤残害忠良，一时流传都下，愈加招致阉党仇恨，郑鄮为此不得不改名换姓，隐遁山谷²。魏忠贤垮台后，郑鄮重又入京，但尚未补官与政，便与阉党徐孽温体仁发生激烈冲突，温体仁则反手相击，以其个人生活品行不端为藉口，在崇祯八年仲冬，倾害郑鄮入狱，并试图由此发端，向郑鄮的好友、同榜进士文震孟和黄道周等东林核心成员发难，伺机一网打尽³。

温体仁一辈给郑鄮安设的罪状，主要是所谓违逆人伦，“迫父杖母”（后来为铸成死狱，又诬以“奸媳奸妹”）。关于“迫父杖母”这一事件，明末以来，众说纷纭。其中较为质实的说法，应属黄宗羲所撰《郑崧阳先生墓表》、清人卢文昭所见当时明廷审理的案卷以及计六奇《明季北略》、文秉《烈皇小识》两书讲述的情况，大意谓“郑（鄮）为孝廉时，父振先私宠一婢，为嫡吴氏所虐。振先与子谋，假乱仙以怵之。吴氏惧，甚愿受杖以赎罪，即令此婢行杖。行次，鄮不禁失笑。吴氏大怒，谓渠父子私构此局，遍诉三党。于是喧传有杖母之事。”⁴

按照当时的社会伦理，郑鄮的某些行为举止，确实很容易惹人非议。尽管那些同情郑鄮的人，做过种种对他有利的解释，至今亦颇有一些人因为无条件褒扬东林党人的缘故，仍然极力为郑鄮辩白，但我们看郑氏挚友黄道周不惜一切代价挺身施救，不仅为此失去入阁为相的机会，甚至由此引发，最终导致锒铛入狱，却从未正面为郑鄮“杖母”一事做过辩解，就说明连他也并不认为此事纯属诬枉。东林党人黄景昉和陈子龙对郑鄮品行亦颇有微词，陈氏竟谓其人“本公论所斥，诸君子误收之”⁵，而明亡后顾炎武作诗咏及彼人彼事，更有“宵人何意附东林”之句⁶，直将郑鄮视作宵小奸徒，诸君所作评判，自当事出有因。总之，虽然谁都看得出来，郑鄮入狱受审，是赤裸裸的政治迫害，但他也确有贻人口实的瑕疵。惟金无足赤，世无完人，郑鄮立朝大节，正义凛然，足以彪炳千秋，与天地长存，与日月同辉。

温体仁等人思强以欲加之罪置郑鄮于死地，实施起来，仍遇到很多障碍。郑鄮系狱受审，

¹ 清计六奇《明季北略》（北京，中华书局，1984）卷一五“郑鄮本末”条，页261。

² 清黄宗羲《黄宗羲全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第10册碑志类《郑崧阳先生墓表》，页270—271。明郑鄮《崧阳草堂文集》（1932年族孙郑国栋木活字印《崧阳全集》本）卷一六《天山自叙年谱》，页22b。

³ 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北京，中华书局，1977）卷六六《东林党议》，页1055。清计六奇《明季北略》卷一五“磔郑鄮”条，页258。《明史》（北京，中华书局，1974）卷二五五《刘宗周传》，页6581。

⁴ 清黄宗羲《黄宗羲全集》第10册碑志类《郑崧阳先生墓表》，页270—271。清萧穆《敬孚类稿》（合肥，黄山书社，1992）卷一四《记郑鄮狱》（页386—387）转述严元照《蕙棊杂记》。清计六奇《明季北略》卷一五“郑鄮本末”条，页259—263。文秉《烈皇小识》（上海，上海书店，1982，影印神州国光社《中国历史研究资料丛书》本）卷四，页111。

⁵ 清计六奇《明季南略》（北京，中华书局，1984）卷八“黄道周志传”条，页317。明陈子龙自撰《年谱》（清嘉庆八年簪山草堂刊《陈忠裕公全集》附刊本）卷上崇祯十五年，页22a。

⁶ 清顾炎武《亭林诗集》（清康熙潘耒遂初堂原刻本）卷四《陆贡士来复述昔年代许舍人草疏攻郑鄮事》，页3b—4a。

因之持续很长时间。直到崇祯十二年八月，始强行定讞，郑鄮终惨遭凌迟虐杀¹。在殉难之前，从崇祯十年二月底起，因刑部尚书冯英等坚持郑鄮罪不至死，温体仁便指示人将其羁押场所由刑部西库转至锦衣卫南狱，也就是移送所谓“诏狱”，以期如愿锻炼成案。这次“移狱”，意味着向郑鄮宣告了必死的结局²。

这一年，郑鄮四十四岁。假如能够逍遥世外，读书作学问，正是黄金年龄，可他却是在饱受酷刑之后，深囚死牢，待人宰割。在这段人生最后时光里，郑鄮的心绪反而非常淡定，将入锦衣卫狱之际，即口占遗嘱诗云：“怨尤俱泯知天近，忧患无方学《易》过。四十四年今勘破，朝闻犹不恨蹉跎。”³在同一牢房里，关押着一位叫雷应元的人，随身携带有一套苏轼的集子。郑鄮自述云：“时宰方谋亟杀余，无片纸出入，幸从雷生借观，不减东坡海外借得陶柳诗也。”⁴

郑鄮的诗文词藻，在当时颇具声名。黄道周上言解救他时，甚至讲过“文章意气，轘柯拓落，臣犹不如钱谦益、郑鄮”这样的话，将其与钱谦益齐名并称，希冀崇祯皇帝能够惜才怜物，放他一条生路⁵。而郑鄮论诗，又一向推崇苏轼，入狱前就曾多次应和苏诗原韵，并有句云“独步东坡白鹤吟”⁶。今于绝命前得此东坡全集，适可引以自励自慰，因谓苏轼梦中所得“惟有不贪宝，凛然照尘寰”这一绝笔诗句，“廉顽立懦，斯以为百世之帅也”⁷。

在狱中重读苏诗这段短暂的日子里，郑鄮做了两件与苏轼及其诗作相关的事情。一是编录了一部苏东坡诗选本，乃“简鄮所时欲讽者，置枕案间”。郑鄮附记识语云：“人间事何当之有？柴桑金马，海外圆扉，是一是二，愿从先生下一转语。”⁸这显然是在借苏诗来纾解悲愤。

郑鄮在狱中做的另一件事情，就是编纂这部《考定苏文忠公年谱》。郑鄮自序云：“旧有《东坡先生纪年录》，殊芜漫。王五羊《年谱》刻于《坡仙集》后者，经李、焦二老所点定，较爽而少疏，其在《志林》、别集者不载见也。……长儿珏以余病瘫，泣请金吾，同系视疾，命日诵数章，日授而詮次之。乃觉坡公须眉朗然照人，千载上下，恍恍如对后之览者，知《东坡先生考定年谱》，成于明后学郑鄮系锦衣狱之日也。鄮以崇祯丁丑二月廿八日移狱，阅四月之望而书成。”⁹

郑鄮提到的苏轼旧谱，《东坡先生纪年录》的作者为宋人傅藻，所谓王五羊者则是指宋人王宗稷。宗稷字伯言，五羊是他的籍贯，撰著的苏轼年谱名为《东坡先生年谱》。郑鄮撰此《考定苏文忠公年谱》，便是针对王宗稷旧谱的疏误，加以订正。

郑鄮遇难时，一直在狱中照料起居的长子郑珏微幸免于同遭杀戮，从而得以将此年谱以及郑鄮在狱中所删定诗集以及后来统名为《峯阳草堂说书》的经学讲义等著述带回家中¹⁰。郑鄮著述在身后的刊行情况，记载不是十分清楚，惟崇祯十一年春郑鄮在狱中所定十六卷诗集，明亡前曾刊行于世，但入清后版已不存。至康熙三年，少子郑毓复拟重刻诗集，郑珏又增益崇祯十一年春以后罹难前新作诗篇，分为两卷，以及《国风赋》一卷、《楞严偈》一卷，

¹ 清谈迁《国榷》（北京，中华书局，1958）卷九七，页5848。

² 明郑鄮《峯阳草堂文集》卷一六《天山自叙年谱》，页27b—30a。

³ 明郑鄮《峯阳草堂诗集》（1932年族孙郑国栋木活字印《峯阳全集》本）卷一六《后狱中草》上《崇祯丁丑二月廿八日自西曹移南狱，闻当事者必欲杀我，踉跄就系间口占遗嘱，付长儿笔受，侑以韵言四首》，页2a—3b。

⁴ 明郑鄮《峯阳草堂文集》卷一五《考定苏文忠公年谱》自序，页1a；又卷四《选苏东坡诗序》，页19a—19b。

⁵ 明黄道周《黄漳浦集》（清道光间陈寿祺编刻本）卷二《三罪四耻七不如疏》，页18a。

⁶ 明郑鄮《峯阳草堂诗集》卷六《陈秋涛先生佳什赠别，奉次来韵》，页13b—14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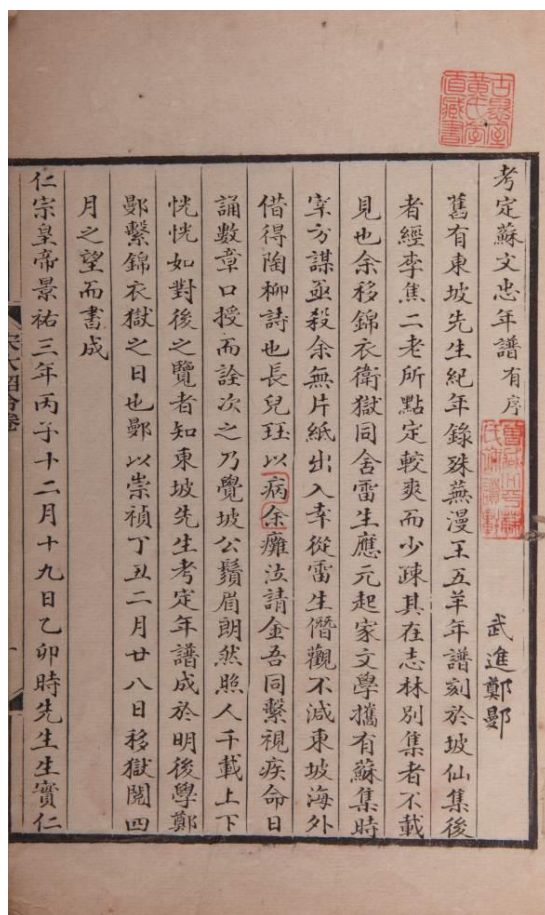
⁷ 明郑鄮《峯阳草堂文集》卷四《选苏东坡诗序》，页19a—19b。

⁸ 明郑鄮《峯阳草堂文集》卷四《选苏东坡诗序》，页19a—19b。

⁹ 明郑鄮《峯阳草堂文集》卷一五《考定苏文忠公年谱》自序，页1a—1b。

¹⁰ 明郑鄮《峯阳草堂文集》卷一六《天山自叙年谱》，页30a—34a。

成《峯阳草堂诗集》二十卷，谋付梓人，同时还一并刻有郑鄮文集以及经学讲义¹。检崔建英著《明别集版本志》，著录有《峯阳草堂诗集》二十卷，清康熙刻本，镌有郑珏所书“弟兢谋付梓人”识语，应当就是这个合刻本中的诗集部分²。民国时郑鄮十九世裔孙郑国栋谓“先太史《草堂集》三十六卷，康熙间鲁庵公刊行”³，似乎也是在讲这个本子，即其《诗集》二十卷与《文集》十六卷。



苏继庠旧藏清抄本《考定苏文忠公年谱》内文首页

郑鄮这部《改定苏文忠公年谱》，被编为《峯阳草堂文集》第十五卷，理应随之广泛流传。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峯阳草堂文集》在当时流传的范围，实际十分有限。这一点，从邵长蘅和查慎行在康熙中期相继考订王宗稷旧谱的编年却都没有提及郑鄮新谱的情况，就可以看得一清二楚（案邵长蘅有据王宗稷旧谱重订的《东坡先生年谱》一卷，见所删补《施注苏诗》卷首；查慎行有《补注东坡编年诗》五十卷，并撰《苏诗补注年表》一卷，冠于《补注东坡编年诗》篇首，于王谱亦多有驳正）。紧接着，乾隆年间禁毁违碍书籍，“峯阳草堂集”又名列其间⁴。观诏修《四库全书》之初，浙江巡抚尚探进有“《峯阳草堂集》三十六

¹ 明郑鄮《峯阳草堂诗集》卷首清人黄永《郑太史遗集序》，页 1a—3b；又卷首目录文末郑珏识语，页 19a。

² 崔建英《明别集版本志》（北京，中华书局，2006），页 781。案崔氏所据，为湖南省图书馆藏本，《中国古籍善本书目·集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著录中国大陆地区公藏仅此一本（页 847），但实际上仅这《诗集》部分也不完全，阙失很多卷次。又案据崔氏《明别集版本志》著录（页 781），浙江图书馆尚藏有崇祯年间刊刻的一部八卷本《峯阳草堂诗集》，首有崇祯元年陈继儒序。其具体内容和刊刻时间，似乎都还有待查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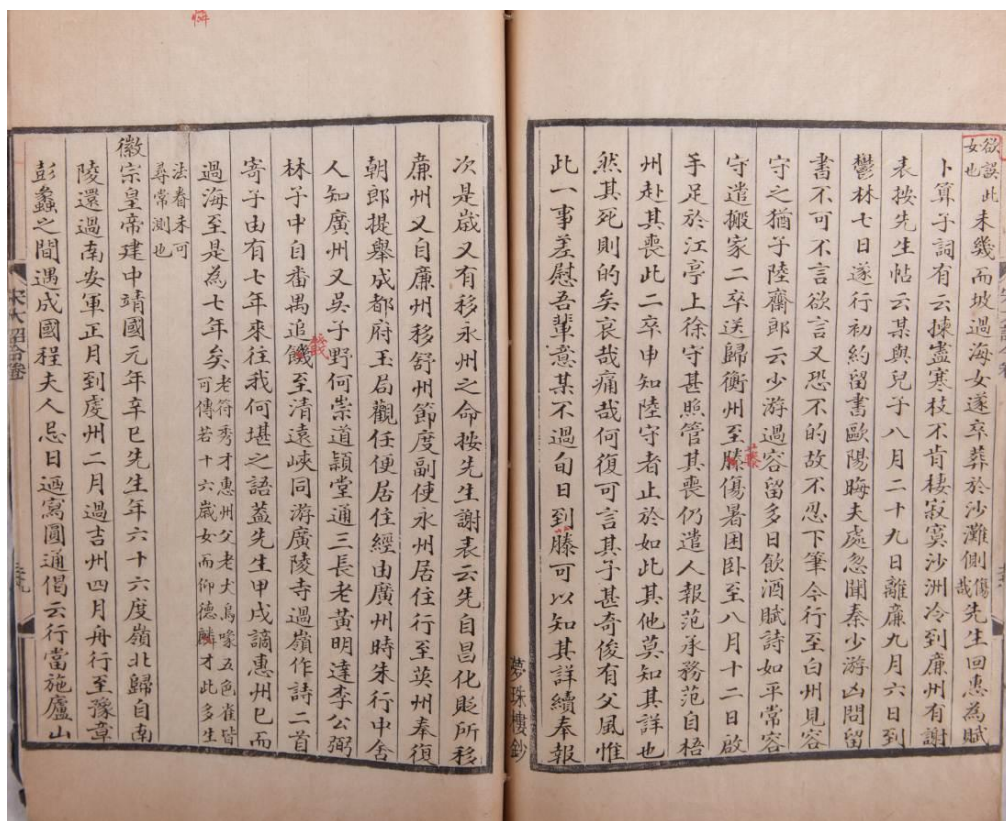
³ 见 1932 年郑国栋木活字印《峯阳全集》卷末所附郑氏自撰跋文，页 1a。

⁴ 清姚觐元《清代禁毁书目》（上海，商务印书馆，1957）之《禁书总目·军机处奏准全毁书目》，页 51；又《违碍书目·应缴违碍书籍各种名目》，页 164；又《补遗》一，页 211。雷梦辰《清代各省禁书汇考》

卷刊本”¹，可知在弘历禁毁之前，还可以找到郑鄮诗文集之康熙原刻全本，而厉禁之后，剩存的书籍，变得愈为寡少。故王文诰在嘉庆年间撰著《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总案》时，同样也未能利用郑鄮改定的年谱。

及至咸丰七年（丁巳），有邑人名张士浩者（号震斋），始设法寻觅抄录郑鄮著述的诗文部分，于咸丰九年（己未）刻印《峯阳草堂集》三十六卷行世，其中包括《文集》十六卷，《诗集》二十卷。孰知“未期年而有庚申之难”，亦即遭遇咸丰十年太平军将领李秀成东征苏常之役，战火焚荡之余，印本所剩无几，就连郑氏族人也未能保有全书²，世人依旧难以获读郑鄮的著述，以至民国时人称当地旧志竟将郑鄮此集记为“已佚”之书³。

明白以上背景，我们才能够更好地理解苏继庠先生购藏这部清抄本《改定苏文忠公年谱》的缘由，并得以真切体会其丰富的历史学、文献学知识。苏继庠先生当年郑重收储此书，自然是由于《峯阳草堂集》之康熙、咸丰两个刻本都传世极罕，特别是其《文集》部分是否尚有旧刻本存世，在世间藏书几乎尽归国有的今天，仍然不大容易认定，故舍此抄本无以获读《改定苏文忠公年谱》。苏氏此举适凸显这部清抄本的独特文献价值。



苏继庠旧藏清抄本《考定苏文忠公年谱》内文

这部抄本字迹精美整饬，间有朱笔校字，亦端谨不苟。抄书纸张印有墨格，版心处镌“宋大诏令卷”字样，板框右下角外雕印“梦珠楼钞”四字。据云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宋大诏令集》抄本，所用纸张与之相同⁴，应是同一时期抄录。又审文中“寧”字已经讳改为“甯”，

（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之浙江省奏缴书籍，页 241。

¹ 清沈初等《浙江探进遗书总录》（北京，中国书店，2008，《海王村古籍书目题跋丛刊》影印清乾隆三十九年浙江巡抚官刻本）癸集下，页 392。

² 见 1932 年郑国栋木活字印《峯阳全集》卷末所附郑氏自撰跋文（页 1a）和章贡跋文（页 1a—1b）。

³ 明郑鄮《峯阳草堂诗集》卷首近人钱振鐸序，页 3a—3b。

⁴ 见北京中华书局 1962 年印《宋大诏令集》卷首《校点说明》，页 3。

似属晚清抄本。书卷首页钤“古愚室黄季直藏书”朱文方印，以及“曾藏太平苏氏补读轩”朱文长方印章。单本孤帙，即便度藏，又宜展读。

直至民国二十一年，亦即公元 1932 年，常州郑氏族人始借录当地名士钱振鏞偶然得到的一部咸丰刻本《峯阳草堂集》，在钱振鏞和其他一些社会人士的赞助下，以当地民间盛行的廉价木活字排印三百馀部，分赠亲友¹，包括《考定苏文忠公年谱》在内的郑鄮诗文，重又稍稍流布。不过，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来，直至改革开放，中国社会，一直动荡不已，书籍之厄，尤甚于以往任何时期。这区区三百馀部印本，能够存留于世者也已经数量无多。近年坊间汇印《四库禁毁书丛刊》，收录郑鄮诗文集，即用此民国活字印本为底本，而其《峯阳草堂诗集》部分尚有阙卷，足以说明这种民国活字印本已属罕传秘笈。再加上各地公共图书馆占山为王，为读者查阅书籍设置重重障碍，致使专门研究苏轼诗文的学者，仍然不大容易注意到收录在郑鄮文集当中的这部年谱。例如中华书局近年出版的孔凡礼著《苏轼年谱》，稿凡四易，前后历时十几年始撰著成书，堪称苏轼行事和诗文编年的集大成之作，却还是未能参考这部与其具有直接关系的《改定苏文忠公年谱》，就不能不说是一个小小的遗憾，这也更显示出这部苏继庠先生旧藏抄本确是难得一见的珍品。

千古奇冤，一腔悲情所系，三百多年来若隐若现，不绝如缕。不知谁人有此因缘，得以宝诸于室。

2012 年 4 月 18 日记

刊《国学茶座》第一期，山东人民出版社，2013 年 9 月

¹ 见 1932 年郑国栋木活字印《峯阳全集》卷末所附郑氏跋文，页 1a—2a。